



## 《影梅庵忆语》的收藏与闲谈

□彭伟



如皋冒襄是明末清初的名士,集书法家、诗文家、收藏鉴赏家于一身。他著有《影梅庵忆语》,追忆与爱姬董小宛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成为忆语体文学的开山鼻祖。此书版本甚多,屡屡重印,尤于清末民国,各种线装本、平装本,纷纷现身书林。此类印书,不比清初刻本《影梅庵忆语》珍贵,如今也不多见。

去岁入秋,我遇到一册清末石印本《影梅庵忆语》。封面、封底“支离破碎”——书名部分几近脱落,仅见大半个“影”字;正面贴有白纸,底面贴有黄纸,粘好破损处。内页品相得益“胜”——白纸黑字间,灰斑点点,最可惜的是不少页的顶端切口处,均有半圆形的蓝色墨水印。如此差品,我还是买下,一则价廉,二则可读。

旧书上手后,我匆匆阅览,正文中录有杜茶村(即杜濬)的评语,可知此版《影梅庵忆语》最初源自《虞初新志·影梅庵忆语》。封面题签落款为“淮南吴仲署”,扉页题字者为桃谿。正文前依次是宋实颖《读巢民先生〈影梅庵忆语〉感赋四绝》、冒襄和诗、冯恺章《题巢民老年道兄〈影梅庵忆语〉次芝麓宗伯韵调寄贺新凉》、陈弘结《〈影梅庵忆语〉题词》、陈文述《董小宛像》、张明弼《董小宛传》、冒襄《亡妾董小宛哀辞并序》。从内容到题签,这册清末石印本直接翻刻于拜鶴楼木刻本《影梅庵忆语》。2022年夏秋之际,苏州博物馆推出《美人姓董:古代董氏女性文物特展》,还展出一册同版《影梅庵忆语》,可见此书还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我更看中石印本《影梅庵忆语》的文献价值。书中所录相关诗文,素来少见,对于读者了解冒襄、董小宛的历史,大有裨益。像陈文述于长诗《董小宛像》写尽小宛的才华:读遍宫词又楚词,手裁玉版写乌丝。一编《奁艳》尤新异,千古红闺绝妙辞。诸如此类的诗文,读来令人对冒襄、小宛的爱情故事艳羡不已。尤其是《亡妾董小宛哀辞并序》写得尤为感人。哀文共计240韵,2400字。序言与结尾呼应:

今辛卯献岁二日长逝,永别哀辞者已踰六十有五日。青天沈,碧海竭,阳翔晦,蕊渊缺,梅魂葬,幽兰啼,鸚鵡梦,杜鹃凄。此六十五日中,如中千日酒,如行万里云雾,如五官百骸散失,又荒然如瘕虫之难吐……

小宛逝世后的65天,才华横溢的冒襄才写下《亡妾董小宛哀辞并序》。写作此篇的感慨,哀辞结尾也有记述:“哀文积于胸臆六十五日,两日夜成。”对于冒襄来说,那65天可谓痛苦不堪。两日两夜写成的哀辞,是他对小宛无尽的思念。他将小宛喻为梅花,与小宛生前所居影梅庵相得益彰。“鸚鵡梦,杜鹃凄”都是悲伤凄凉的典故,烘托他连续多日失魂落魄的形象。冒襄久久不能忘怀小宛,倒不是迷恋美色,正如他在哀辞结尾表白,读者阅过此文,应当明白他不是好色的登徒子。他对小宛的念念不舍,更多缘起精神层面。他于序中,不禁慨叹:“子非仅余之静友,实余之鲍叔、钟期也。天下有一人知己,死而不憾者。”在冒襄的心目中,小宛不仅是红颜,还是知己。红颜易寻,知己难求。尽管晚明时期十分开放,冒襄又先是爱上陈圆圆,接受小宛的感情后,又曾纳妾,但是在小宛离世后,他对小宛的思念是很真诚的。夫妻精神上的愉悦,怎能不令人艳羨呢?

令人羡慕的爱情故事,世间还有不少。不妨从书上的一列签名、两个印章说起。封面的白纸下方写有竖排签名“李剑华 八九年十二月”,扉页及次页分别钤印:朱文“胡绣枫印”,白文“李剑华印”。李剑华(1900-1993),四川大邑人,著名社会学家,早年负笈东瀛,就学于东京日本大学,回国后任职上海法科大学、国立劳动大学、复旦大学诸校,又参与筹建“东南社会学会”,加入左翼联盟,主编《流火月刊》《现象月刊》。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任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华东政法大学劳动法教授、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主任等职,晚年负责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工作。他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社会问题的中国社会学家之一,也是一位地下党员。胡绣枫是李剑华的夫人。她还是女作家关露的妹妹。李剑华、胡绣枫夫妇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为党做过很多秘密工作。关露正是在胡绣枫的推荐下,打入76号魔窟,成为如今家喻户晓的红色特工。民国很像南明,政局不稳,兵燹不断,在那个年代坚持下来的爱情,着实不易。李先生辞世,胡绣枫挽联写道:“结缡六十载,幸得平生知己,不论月夕花晨,谈诗论政,未曾意见相左”,两人真挚的情感,可见一斑。

李剑华、胡绣枫喜好这册《影梅庵忆语》,不但各自钤印,而且对封面、封底进行修补,更为正文页中补入衬纸,以便保存。他俩对此事的情珍爱,是不是和羡慕冒襄、小宛的真挚情感有关呢?



## 十年磨一剑 ——写在《从传统小农到新型农民》出版之际

□葛志华

2022年4月,我利用因防疫需要居家隔离的两周时间,对断断续续写了十年的书稿,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补充,形成了这部三十多万字的书稿,战战兢兢地交给江苏人民出版社。半年后的十月,我再次利用住在隔离酒店的一周时间,根据责任编辑的要求,对书稿进行了最后的修改与润色,并核对了所有的引文与注释。

我是一名党政机关干部,没有评职称的动力,也没有做课题的压力,撰写这部书纯属自讨枷锁、自讨苦吃。但这绝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是一种内在自觉。这种内在自觉半是源自时代的呼唤,半是源自社科工作者的责任。

就时代的呼唤而言,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身逢现代化的进行时,几乎每天都能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气息与变化。十年前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我国现代化的时间表与“四化同步”的路线图,党的十九大又吹响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集结号。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大又描绘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届党代会既一脉相承,又不断超越,奏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乐章。现代化与农民具有特殊的内在关联,既要让农民不当农民,又要让农民当好农民;既要让农民成为“历史弃子”,又要让农民成为“时代宠儿”。因此,只有立足大国小农的基本农情,顺应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理清“剪不断,理还乱”内在关联,才能更好地把准方向,精准施策;才能更有效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四化同步,补齐中国式现代化的短板。这就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就社科工作者的责任而言,法国著名学者H·孟德拉斯以法国农村现

代化为背景,聚焦农民终结这一时代主题,出版了不朽的名著——《农民的终结》。作者在该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一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人口处,这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重要问题”。法国素有“欧洲的中国”之称,虽然与我国的社会制度、历史背景、现代化道路各异,但农业经营体制有诸多相似之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值得我国学习借鉴。中国作为世界上农民人数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农民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且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兴衰成败。因此,对我们这些社科工作者而言,H·孟德拉斯这句话昭示着一种特殊的意义,更是一份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H·孟德拉斯是一位严谨的学者。

从198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入职党政机关算起,我研究“三农”三十多年,虽然发表了几百篇论文,出版了六部著作与四部文集,获得过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大奖,但心中仍有许多困惑与谜团。诚如老子所说:“少则得,多则惑;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学习越

多就越感到自己无知,研究越深入困惑也就越多。这些无知与困惑犹如心仪的恋人在不远处暗送秋波,让人欲罢不能,明知自讨苦吃,也义无反顾,一往无前。

然而,真正写起来还是挺难的,多次萌发了放弃的念头。个中原因除了资料准备不充分等主观因素外,又与这个课题的特殊性有关。这是因为中国“三农”问题之复杂、牵涉的领域之广泛、纠结的历史之繁琐,都是其他学科所罕见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空交汇中,一种现象往往会掩盖另一种现象。而且,中国式现代化处在现在进行时,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充满不确定性与易变性。这些都需要长时间的跟踪与研究,进行多学科的透析与扫描。只有这样,才能践行“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

精神,所做出的学术结论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因此,十年时间看起来十分漫长,也只是现代化的切片而已。

当然,这十年的心血也没有白费。比如,使我的学习更加系统,三农问题牵涉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统计学、农学等诸多学科,不进行系统的学习,就无法从不同学科切入这一主题,更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又如,使我的研究不断深入,深化了对农业与现代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城乡融合发展等的认识,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研究水平;再如,促使我的工作更有热情,我长期从事三农工作,虽然工作岗位一调再调,但都与三农有关。务实与务虚的结合,使我的工作思路更加清晰,也更有理性。

H·孟德拉斯是一位严谨的学者。

他在1964年出版的《农民的终结》一书中,用“可能的未来”作为全书的结论,1984年,该书再版时,作者又加了跋。作者认为该书出版后二十年的法国乡村变迁证实了他的基本结论与预言。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日前农村中从事家庭经营的是以营利和进行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的农业劳动者。从传统小农到新型农民、从“历史弃子”到“时代宠儿”、从“现代化初民”到现代公民,这就是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演变轨迹。

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

“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我国农民也一定能实现从传统小农到新型农民的脱胎换骨、从身份到职业的凤凰涅槃。

就社科工作者的责任而言,法国著名学者H·孟德拉斯以法国农村现

代化为背景,聚焦农民终结这一时代主题,出版了不朽的名著——《农民的终结》。作者在该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一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人口处,这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重要问题”。法国素有“欧洲的中国”之称,虽然与我国的社会制度、历史背景、现代化道路各异,但农业经营体制有诸多相似之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值得我国学习借鉴。中国作为世界上农民人数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农民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且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兴衰成败。因此,对我们这些社科工作者而言,H·孟德拉斯这句话昭示着一种特殊的意义,更是一份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H·孟德拉斯是一位严谨的学者。

从198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入职党政机关算起,我研究“三农”三十多年,

虽然发表了几百篇论文,出版了六部著作与四部文集,获得过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大奖,但心中仍有许多困惑与谜团。诚如老子所说:“少则得,多则惑;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学习越

多就越感到自己无知,研究越深入困惑也就越多。这些无知与困惑犹如心仪的恋人在不远处暗送秋波,让人欲罢不能,明知自讨苦吃,也义无反顾,一往无前。

然而,真正写起来还是挺难的,多次萌发了放弃的念头。个中原因除了

资料准备不充分等主观因素外,又与这个课题的特殊性有关。这是因为中国“三农”问题之复杂、牵涉的领域之广泛、纠结的历史之繁琐,都是其他学科所罕见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极不

平衡,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空交汇中,一种现象往往会掩盖另一

种现象。而且,中国式现代化处在现在进行时,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充

满不确定性与易变性。这些都需要长

时间的跟踪与研究,进行多学科的透

析与扫描。只有这样,才能践行“板

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

学精神,所做出的学术结论才能经得起

时间的检验。因此,十年时间看起来

十分漫长,也只是现代化的切片而已。

当然,这十年的心血也没有白费。

比如,使我的学习更加系统,三农

问题牵涉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

历史学、统计学、农学等诸多学科,不

进行系统的学习,就无法从不同学科

切入这一主题,更不能透过现象看本

质;又如,使我的研究不断深入,深化了

对农业与现代化、农民合作经济组

织、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城乡融合发

展的认识,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研究水

平;再如,促使我的工作更有热情,我

长期从事三农工作,虽然工作岗位一

调再调,但都与三农有关。务实与务虚

的结合,使我的工作思路更加清晰,也

更有理性。

H·孟德拉斯是一位严谨的学者。

从1964年出版的《农民的终结》一

书中,用“可能的未来”作为全书的结

论,1984年,该书再版时,作者又加了跋。

作者认为该书出版后二十年的法国

乡村变迁证实了他的基本结论与预言。

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农

民已经不存在了,日前农村中从事家

庭经营的是以营利和进行市场交换为

生产目的的农业劳动者。从传统小农到

新型农民、从“历史弃子”到“时代宠

儿”、从“现代化初民”到现代公民,这

就是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演变轨迹。

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

“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

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伴随

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我国农

民也一定能实现从传统小农到新型农

民的脱胎换骨、从身份到职业的凤凰

涅槃。

就社科工作者的责任而言,法国著名学者H·孟德拉斯以法国农村现

代化为背景,聚焦农民终结这一时代主题,出版了不朽的名著——《农民的终结》。作者在该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一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人口处,这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重要问题”。法国素有“欧洲的中国”之称,虽然与我国的社会制度、历史背景、现代化道路各异,但农业经营体制有诸多相似之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值得我国学习借鉴。中国作为世界上农民人数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农民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且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兴衰成败。因此,对我们这些社科工作者而言,H·孟德拉斯这句话昭示着一种特殊的意义,更是一份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H·孟德拉斯是一位严谨的学者。

从1964年出版的《农民的终结》一

书中,用“可能的未来”作为全书的结

论,1984年,该书再版时,作者又加了跋。

作者认为该书出版后二十年的法国

乡村变迁证实了他的基本结论与预言。

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农

民已经不存在了,日前农村中从事家庭

经营的是以营利和进行市场交换为生

产目的农业劳动者。从传统小农到新型农

民、从“历史弃子”到“时代宠儿”、从“现代化初民”到现代公民,这就是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演变轨迹。

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

“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

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伴随

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我国农

民也一定能